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点建设文库

民族学
林雁工俊

清代历史笔记论丛


姚继荣 著

民族出版社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点建设文库

清代历史笔记论丛

姚继荣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历史笔记论丛 / 姚继荣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 - 7 - 105 - 13253 - 9

I. ①清… II. ①姚… III. ①中国历史—笔记—清代
IV. ①K249. 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6919 号

策划编辑: 李志荣

责任编辑: 郎 洁

封面设计: 金 晔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e56.com.cn>

印 刷: 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北京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500 千字

印 张: 36.5

定 价: 8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3253 - 9/K · 2333 (汉 1297)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 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24782

目 录

一	清代历史笔记及史料价值	1
	○清代学术思潮与史学发展大势	1
	○清代的笔记、史料笔记与历史笔记	7
	○清代历史笔记的史料价值与缺陷	13
	○清代历史笔记的出版、研究与利用	23
二	顺治至雍正朝历史笔记	30
	○概说	30
	陆文衡与《啻庵随笔》	41
	王家祯与《研堂见闻杂记》	43
	梁维枢与《玉剑尊闻》	47
	陈忱与《读史随笔》	51
	谈迁与《枣林杂俎》、《枣林外索》和《北游录》	52

孙承泽与《山书》	59
冯班与《钝吟杂录》	63
王崇简与《谈助》、《冬夜笈记》	66
张怡与《玉光剑气集》	68
张尔岐与《蒿庵闲话》	70
顾炎武与《日知录》、《菰中随笔》	74
彭孙贻与《客舍偶闻》	81
余怀与《板桥杂记》、《东山谈苑》	83
陈舜系与《乱离见闻录》	88
王夫之与《识小录》	91
叶梦珠与《阅世编》	93
毛奇龄与《胜朝彤史拾遗记》	95
姚启圣与《以俟集遗编》	97
褚人获与《坚瓠集》	98
董含与《三冈识略》	100
吴肃公与《明语林》	102
曹家驹与《说梦》	105
张宸与《平圃杂记》	106
钮琇与《觚剩》及续编	109
冯甦与《见闻随笔》	112
赵吉士与《寄园寄所寄》	113
屈大均与《广东新语》	116
王士禛与《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 《古夫于亭杂录》和《分甘余话》	119
宋荦与《筠廊偶笔》及二笔	126
王晔与《今世说》	129
高士奇与《天禄识余》、《金鳌退食笔记》	132
刘献廷与《广阳杂记》	136

张潮与《虞初新志》	138
刘廷玑与《在园杂志》	140
李延罡与《南吴旧话录》	144
查慎行与《人海记》	146
纳兰性德与《渌水亭杂识》	147
徐逢吉与《清波小志》	149
金埴与《不下带编》、《巾箱说》	152
徐昂发与《畏垒笔记》	156
汪景祺与《读书堂西征随笔》	158
三 乾隆至嘉庆朝历史笔记	161
○概说	161
陆廷灿与《南村随笔》	171
顾公燮与《丹午笔记》	174
王应奎与《柳南随笔》及续笔	178
徐昆与《遁斋偶笔》	181
严有禧与《漱华随笔》	183
刘靖与《片刻余闲集》	185
龚炜与《巢林笔谈》及续编	187
江昱与《潇湘听雨录》	191
袁枚与《随园随笔》	193
卢文弨与《钟山札记》	198
刘希向与《三冬识余》	202
袁栋与《书隐丛说》	204
王鸣盛与《蛾术编》	206
纪昀与《阅微草堂笔记》	210
秦武域与《闻见瓣香录》	213
阮葵生与《茶余客话》	215

赵翼与《檐曝杂记》、《陔余丛考》	220
钱大昕与《十驾斋养新录》及余录	224
沈初与《西清笔记》	228
徐承烈与《听雨轩笔记》	230
姚鼐与《惜抱轩笔记》	233
胡承谱与《只麈谭》、《续只麈谭》	236
萧爽与《永宪录》	239
桂馥与《札樸》	242
戴璐与《藤阴杂记》	244
王念孙与《读书杂志》及余编	247
李斗与《扬州画舫录》	249
刘寿眉与《春泉闻见录》	252
俞蛟与《梦厂杂著》	254
法式善与《陶庐杂录》、《清秘述闻》和《槐厅载笔》 ..	257
郝懿行与《宋琐语》	262
钱泳与《履园丛话》、《熙朝新语》	265
赵慎畛与《榆巢杂识》	271
吴长元与《宸垣识略》、《燕兰小谱》	274
姚元之与《竹叶亭杂记》	278
俞正燮与《癸巳类稿》、《癸巳存稿》	280
梁章钜与《南省公余录》、《枢垣记略》、《退庵随笔》、 《归田琐记》、《浪迹丛谈》及续谈和三谈	284
昭槿与《啸亭杂录》及续录	291
佚名与《野语》	294

四 道光至同治朝历史笔记

○概说

桂超万与《宦游纪略》、《续宦游纪略》

姚莹与《识小录》、《寸阴丛录》和《康輶纪行》	311
吴振械与《养吉斋丛录》及余录	315
刘宝楠与《愈愚录》	317
叶廷琯与《吹网录》、《鸥陂渔话》	319
梁绍壬与《两般秋雨盒随笔》	322
朱克敬与《儒林琐记》《雨窗消意录》、 《瞑庵杂识》及二识	326
沈涛与《铜熨斗斋随笔》	330
祁寯藻与《枢廷载笔》	332
顾禄与《清嘉录》、《桐桥倚棹录》	334
朱翊清与《埋忧集》	338
梁廷枏与《海国四说》、《夷氛闻记》	340
柯悟迟与《漏网喁鱼集》	342
陆筠与《海角续编》	344
韩泰华与《无事为福斋随笔》	345
管庭芬与《浣溪日记》	347
王庆云与《石渠余纪》	350
甘熙与《白下琐言》	352
段光清与《镜湖自撰年谱》	355
张集馨与《道咸宦海见闻录》	356
陆以湑与《冷庐杂识》及续编	359
齐学裘与《见闻随笔》及续笔	362
郭沛霖与《日知堂笔记》	363
叶名沅与《桥西杂记》	365
许宗衡与《玉井山馆笔记》	367
毛祥麟与《墨余录》、《三略汇编》	370
陈其元与《庸闲斋笔记》	375
史梦兰与《止园笔谈》	378

梁恭辰与《北东园笔录》及续编、三编和四编	379
苏时学与《爻山笔话》	385
徐时栋与《烟屿楼笔记》	388
福格与《听雨丛谈》	391
乔松年与《萝蘼亭札记》	393
俞樾与《湖楼笔谈》、《九九消夏录》和《春在堂随笔》	394
孙文川与《淞南随笔》	400
黄钧宰与《金壶七墨》	402
王韬与《弢园笔乘》	405
徐宗亮与《归庐谭往录》	408
方濬师与《蕉轩随录》及续录	414
平步青与《霞外摭屑》	417
五 光绪至宣统朝历史笔记	421
○概说	421
王闿运与《湘绮楼日记》	431
吴大澂与《窞斋日记》、《窞斋自订年谱》	433
欧阳昱与《见闻琐录》	436
薛福成与《庸盦笔记》	440
吴汝纶与《桐城吴先生日记》	443
陈康祺与《郎潜纪闻》及二笔、三笔和四笔	448
丁柔克与《柳弧》	451
王之春与《椒生随笔》	455
缪荃孙与《艺风堂杂钞》、《艺风堂别钞》和 《云自在龕随笔》	460
吴庆坻与《蕉廊脞录》	467
张祖翼与《清代野记》	469
继昌与《行素斋杂记》	472

邹弢与《三借庐笔谈》	475
沈曾植与《海日楼札丛》	477
王树枏与《陶庐老人随年录》	479
何刚德与《春明梦录》、《客座偶谈》	481
陈夔龙与《梦蕉亭杂记》	487
文廷式与《知过轩随笔》、《旅江日记》和 《南韶日记》	490
况周颐与《眉庐丛话》、《续眉庐丛话》和 《餐樱庖随笔》	493
汪康年与《汪穰卿笔记》	499
岑春煊与《乐斋漫笔》	501
恽毓鼎与《崇陵传信录》、《恽毓鼎澄斋日记》	503
于鬯与《花烛闲谈》	506
李岳瑞与《春冰室野乘》、《悔逸斋笔乘》	509
李伯元与《南亭笔记》	512
胡思敬与《国闻备乘》	513
朱彭寿与《旧典备征》、《安乐康平室随笔》	517
罗惇融与《宾退随笔》	520
刘声木与《莼楚斋随笔》及续笔、三笔、四笔和五笔	523
刘成禺与《世载堂杂忆》	526
杨懋建与《京尘杂录》	529
刘体智与《异辞录》	529
欧阳兆雄、金安清与《水窗春呖》	531
陈灏一与《睇向斋秘录》	533
崇彝与《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535
佚名与《蕉窗雨话》	537
佚名与《啁啾漫记》	540
郭则沄与《南屋述闻》	543

孙静庵与《栖霞阁野乘》	545
何圣生与《檐醉杂记》	550
裕德龄与《清宫二年记》	554
许指严与《十叶野闻》	555
徐一士与《近代笔记过眼录》	558
参考文献	571
后记	573

一 清代历史笔记及史料价值

清代的历史，一般说来，是清朝统治全国的历史；而从广义上说，则还包括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在东北的开国史和溥仪逊位后在紫禁城的活动。^① 清代历史笔记所讨论的年限，主要是在顺治至宣统朝（1644—1911）这个时段内。从清代历史笔记发展的实际情况考虑，大略可按顺康雍（1644—1735）、乾嘉（1735—1820）、道咸同（1821—1874）和光宣（1875—1911）朝来把握它的发展和演变之迹。

○清代学术思潮与史学发展大势

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引起了一批知识分子对社会历史的反思，学术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迎来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全新时代。以

^①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1页，沈阳，沈阳出版社，2004。

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具有大略一致的反宋明理学的倾向。他们的学术渊源不同，态度也不一致，有的反对，有的修正，而又一致痛弃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不务实学，以及所造成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①的学风。顾炎武即批评说：“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②他们把明之亡国归咎于宋明理学所造成的学风，这自然不切实际，可也正说明他们是深叹明亡清兴的社会巨变，而要改变明代的虚浮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致力于研究历代的典章制度，从历史的治乱兴衰中探究治世之道。他们开拓了研究的视野，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提出了不少具有启蒙价值的新思想。王夫之作《读通鉴论》，对中国古代历史作出了一些新的论断；顾炎武的《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发表了一些改变旧制度的意见，还表达了“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③的思想；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君主专制制度做出了无情的批判，声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④。他们的思想超越了单纯反清的性质，反映了改变旧制度的进步要求，对晚清的改良运动产生过不小的影响。^⑤

后来，早先的启蒙思潮虽受到扼制而有所消沉，可也伴随社会矛盾的日趋激化而又重新抬头，反映在文化学术领域，主要表现为汉学^⑥的裂变。一些好学好古博学之士，重视考证古代典章制度，恢复了“经世

① 苏轼：《苏轼文集·李氏山房藏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② 顾炎武、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夫子之言性与天道》，长沙，岳麓书社，1994。

③ 顾炎武、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正始》，长沙，岳麓书社，1994。

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91。

⑤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四），20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⑥ 汉学：汉代学者于经学中注重训诂之学。至清代乾嘉朝，学者崇尚这种风气，形成与注重义理的宋学相对的“乾嘉学派”，于文字训诂、古书整理、辑佚辨伪和考据注释有很大贡献，也称之为“汉学”。不过，它又存在泥古、繁琐和脱离实际之弊。

致用”的传统。

至于清朝的统治者，一方面，他们摆出了尊孔崇儒的面目，利用儒家思想控制社会思想文化；而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控制社会文化思想的方式。以后者而言，则无非有二途：一是征人编书，包括修《明史》，编《康熙字典》、《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和《四库全书》，强调主流文化，严禁异端邪说；二是大兴文字狱，案件之多，株连之广，惩治之残酷，超过过去的任何一个朝代，目的在于消除人们的反清意识。即便是吟诗作文，乃至属联拟题，很可能被随意引申曲解，招致杀身、灭族之祸。在这种大背景下，文人心怀忧谗畏讥、惴惴不安的心情，形成了畏惧、郁闷的心态和看风使舵的态度。晚清胡思敬即云：

国朝自庄廷鑑、吕留良、戴名世连兴大狱，文字之禁极严，内外士夫罔敢谈国故者。^①

李祖陶也说：

今之文人，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规景，畏避太甚，见鱗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人心世道，实有关系。^②

清中叶以来，乾嘉汉学大兴。从学术源流上说，它导源于顾炎武；而从学术品格上论，则又是清朝文化专制的结果。在文字狱的恫吓下，人们承袭了明清之际学者的治学方法，可又丢掉了经世致用的研究精神，多不关心当世之务，只埋头于古文献里，从事文字训诂，名物的考证，古书的校勘、辨伪和辑佚之类的工作。在包括文字、音韵、训诂、金石、地理在内的学术领域，他们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而总的看来，又只能说是做了学术研究的基础工

^① 胡思敬：《国闻备乘·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7。

^② 李祖陶：《迈堂文略·与杨蓉诸明府书》，道光十五年（1835）江西鹭洲书院刻本。

作，脱离现实的倾向，导致缺乏理论上的建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遗憾。^①

至19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冲突加剧了，中国要摆脱被宰割的局面，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与政治制度。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机，近代先进分子无不走上从西学中寻求治国药方的道路。同时，西方列强为把中国变为它们的附庸，改善经济掠夺的环境，也需要以传播西学来开路。所以，“欧风美雨”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风云，“西学东渐”成为这一阶段最突出的现象。

鸦片战争以后，采纳西学直接关联变革图强、抗敌救国，成为先进中国人的自觉行动，迅速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潮流。继林则徐编《四洲志》、开研究西方的风气之后，魏源又撰《海国图志》，系统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提出“师夷长技”^②的主张，发出了主动向西方学习的呼声。后来，又有人把进化论、天赋人权、自由民主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学说引入中国。所有这些，必然引起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从而也形成了思想领域的深刻革命。

“西学东渐”之风的深入，又渐次渗透到制度和政策的层面，引发了一些重要的变革，也产生了一系列新事物。废科举，立学校，筹翻译，设书局，办报刊，兴留学，既动摇了旧的教育体制，又传播了新的思想文化，催生了洋务和改良倾向，朝野上下充斥了“新学”与“旧学”的撞击。

不过，在热衷于洋务的年代，人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正像冯桂芬所说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

^①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四），19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② 原文云：“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魏源：《海国图志·叙》，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术”^①，“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②。从体与用、道与器、本与末、礼与艺的关系，来看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③。而当社会变革触及“体”之时，情形也就有很大的不同了。在中学与西学的对比中，对各自的短长看得越来越清晰，传统文化的神圣光环也就渐渐失色，独尊的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从西方引进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要求，越来越自觉，声势也越来越浩大，过去是“用夏变夷”，于今则不免要“用夷变夏”，求新声于异邦而采洋改制了^④。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危急形势，使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中国的知识分子已渐次摆脱传统，向新旧学的混合型士大夫转化了。在他们看来，传统文化必须吸收融会新的东西，以便为社会变革服务。所以，西学的新知已在实际引导他们的行动，使之成为一些分属于不同政治分野知识分子群体了。

从清兵入关到鸦片战争前，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一方面，晚明的腐败与灭亡，清朝统治者一度实行的文化高压政策，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段的史学面貌，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到了此时，思想和文献的积累丰富而厚重，在历史进程中，它们不仅为人们所传承和弘扬，也不断为人们所审视和估量。明清社会所呈现出的衰老景象，新的社会因素开始滋生和微弱发展，从而使这种审视和估量也呈现出新的趋向。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使这一历史时段的史学发展，具有总结和嬗变的特点。总结，既反映在历史思想和史学理论上，也反映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嬗变，则主要反映在历史思想领域。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上海，上海书店，2002。

②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上海，上海书店，2002。

③ 张之洞：《劝学篇·设学》，上海，上海书店，2002。

④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四），355～35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羲和王夫之，乾嘉之年的章学诚、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和崔述，以及稍晚的阮元、龚自珍，^①各有名作，反映了这个阶段史学发展的特点；官修史书和私人撰述虽各有突出成就，而后者则更多反映出史学发展的趋势，代表了这一阶段史学发展的水平。^②

从鸦片战争后到清朝覆亡，是近代史学的萌生、发展阶段。传统史学的嬗变端倪发展呈明显的分化趋势，一方面，表现为传统史学以深厚的根基，还在延续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表现为在民族危机震撼下，人们对历史与现实重新思考而萌生了新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研究。从后者来看，关于鸦片战争史、边疆史地、外国史地的研究和撰述，关于近代意识与世界意识之观念在历史书文中的反映，关于在进化论指导下对“新史学”的提倡，成为这一阶段突出的史学现象。这里所说的“分化”，主要是进化论思想在史学中逐步明显的反映，具体表现为对传统的历史观念和史家之历史撰述内容的批判，还有历史撰述倾向和史家之历史视野的变化。具体说来，近代史学的萌生，呈现出了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注入了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意识；二是传统的历史变化观点注入了近代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想，成为近代改良活动的历史理论上的依据；三是传统史学中的历史进化观点开始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内涵和形式。^③

①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雷塘庵主、怡性老人，扬州仪征（今属江苏）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山东和浙江学政、户部侍郎、湖南和浙江巡抚、湖广总督和体仁阁大学士。他为一代文宗，刊刻《十三经注疏》，又撰有《畴人传》、《经籍纂诂》、《中州金石记》、《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龚自珍（1792—1841），字璦人、伯定，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他工诗文，撰有《己亥杂诗》和《定庵文集》。

②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670～67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③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737～745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